

我国历史上的选贤制度



“选贤与能”出自《礼记·礼运》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”“与”通“举”，“选贤与能”亦作“选贤举能”，即选举贤能之人。

中国自上古时期便已经开始了选贤的实践。夏商周三代之前，帝位继承实行禅让制，推选继承人的过程就是在选贤举能。《史记》记载，尧帝在他在位70年时，希望从四方诸侯中选出继任者，但大家都以德行浅陋而推辞。尧帝则命大家举荐贤德之人，不论其出身是否高贵贫寒。大家都一致推举了舜。舜当时地位低微，但德行高尚，是一位至孝之子。他的父亲不遵德义，母亲不讲忠信，弟弟狂傲无理，但是舜都能用孝顺友爱之心与他们亲睦共处，并运用智慧使他们提升，而不至于发展到奸恶的程度。舜被举荐出来之后，尧帝没有立刻让位，而是对他经过了细致的考察。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，以此来考察他齐家的能力；让自己的九个儿子与舜交朋友，观察他为人处世的能力。结果，尧的两个女儿不敢以骄慢自居，九个儿子都更加忠厚谨慎。尧又命舜处理政务，考察其教化百姓、统领百官、政事、外交、祭祀等能力。最后，再考察舜的生存能力，在山林川泽中遇到暴风雨雷，舜从不迷失方向。3年的考察，可谓历试诸难。在舜的带领下，民皆德化、百事振兴、诸侯和睦、风调雨顺。舜以优异的政绩，在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拥戴。尧才将帝位禅让给了舜。

中国历史上的选贤制度，都能从尧舜这里找到历史渊源。首先，选贤的标准是德才兼备，以德为先。以孝德为本的选贤标准，从尧舜算起，在中国传承了近五千年。其次，在任命之前，要对候选人作全方面考察，就像尧从“公”“私”两方面来考察舜。在“私”的方面，为什么要考察齐家的能力？因为《大学》中说，“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”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无之。“公”的方面，考察的不仅是政绩，还有在民众中的口碑，在“大事”上看德，在“小节”中察德。最后，选贤之后，舜没有立即继位，而是经历了历练和考核，在一个时间段内积累从政经验，再根据政绩以及民众的反响，进行晋升。

从汉代开始，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种重要的选举制度，察举制、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。察举制分为举贤良方正、举孝廉、举直言、举文学、举茂才（秀才）等，即举荐德行高尚志节清白之人，举荐孝敬父母行为清廉之人，举荐能直言极谏之人，举荐博通经史之人，举荐才能出众之人。察举制包含有自上而下的举荐和自上而下的考察，在乡党之间观察德行，在官职之上考察能力，有政绩者再察选至中央，作进一步考试和任用。

察举制中颇具特色的是“进贤受上赏，蔽贤蒙显戮”的连带责任制。这种制度早在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有论述。例如，《群书治要·尸子》中讲到：若能做到举荐贤者有赏，举荐不肖者要负连带责任，若是没能举贤，便是无能之人，如此一来，人们就会多举荐贤者了。而且，臣子若立大功，便追问谁是举荐人，一

同赏赐；若是犯了大过，也同样追问是谁任用了他，连带处罚。到了汉代，连带责任成为一种制度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记载，汉武帝曾下诏命人讨论不举荐贤良的郡县官吏应如何治罪。专司官吏上书分析说：“诸侯向朝廷举荐人才，首次推举得当，则称其‘好德’；第二次推举得当，则称其‘贤贤’；第三次推举人才得当，便称其‘有功’，朝廷对他进行崇高的奖赏。诸侯不向朝廷举荐贤才，第一次贬爵，第二次削地，第三次爵位和土地全部削尽。勾结于下而欺罔君上的人要处死，谄媚于上而欺罔臣民的人要加刑，参与国政而不能造福于民的要弃逐，身居要职而不能进荐贤才的要退位，这就是劝善惩恶的措施。今日诏书要求发扬先代帝王选能举贤的传统，令郡守县令推举孝廉贤才，是为了教化人民、移风易俗。那些对举贤诏令置若罔闻的官吏，当以不遵朝命论处。不能培养与发现贤才，就是不能胜任其职，应该罢免。”专司官吏的上奏被汉武帝采纳。

正因古人深刻认识到了贤才的难得和可贵，所以才有了连带责任制，以保证能够将真正贤德之人举荐出来，而非举荐者的亲私。这种奖赏和追究机制，把能否举荐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，既调动了官员举荐的积极性，也使官员不敢随便荐举无德之人，同时可以形成进贤退不肖的良好政治风气，因此，连带责任制是多被后世效仿的一种有效的荐贤保障制度。

魏晋南北朝兴起起了九品中正制，又称九品官人法，即由朝廷指派中正官，一般是由德行和名望皆高之人担任，将地方上的人才，无论是否已经在任，根据其德行、才能和家世定为九个品次，供吏部选用。其积极意义，是将察举制中注重的德行进行了量化，并且定品时是以德行为先。此外，它还对基层人才进行了普查和梳理，建立了类似今天人才库一样的档案，相比察举制中按照户籍数目举荐孝廉之人的做法，减少了人才遗漏。因此，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察举制的发展。然而，其自身也不乏局限和问题。评定人的德行及个人爱憎会直接影响评定结果，加之没有监督审查，结党营私难以避免。而且，“以德为先”逐渐被“出身为先”所取代，评价时将候选人的出身驾凌于德行之上，导致出现了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，晋朝便多有忠臣上书痛陈九品之弊。最终，这种选人制度被废止。

自隋朝至清朝实行科举制，这是一种以考试取人的制度。中国最早的考试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。《周礼·地官》在“乡大夫”一职中记载，每3年考试一次，考察乡人的德行和技艺，从中选出贤德之人和多才多艺之人，任贤使能。真正将考试选人制度化的是科举制。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，历史上因此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。而梳理历史上各种选贤方式可以发现，设计制度的目的，都是为了将德才兼备之人选拔出来，然而其出现的问题，也都是忽略了“以德为先”这一原则。当一种选举制度弊病丛生，不再能选出贤德之人的时候，必然会被历史淘汰。 聂菲璠

宽宏大度，脱颖而出

婚后的卞夫人很低调，恪守本分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当时，曹操的正室是丁夫人，丁夫人不能生育，曹操又娶了刘夫人，刘夫人死得早，留下曹昂和清河公主由丁夫人抚养。丁夫人视二人如己出。建安二年（197年），曹昂随曹操出征张绣，遭到伏击。为救曹操，曹昂和典韦断后，结果力战而死。这一不幸，让丁夫人心理崩溃，日夜哭泣，并迁怒于曹操。曹操一怒之下，将丁夫人赶回家。心思缜密的卞夫人，极力劝说曹操到丁府把丁夫人接回来，曹操照办了。失魂落魄的丁夫人正坐在织机前，曹操上前安慰一番问道：愿跟我一道回家吗？三番两次请求原谅，结果被拒。似乎，与其说丁夫人被废，不如说是丁夫人废了曹操，曹操想挽回而不能。当时曹操已经被封为司空、行车骑将军，但丁夫人却完全不给他面子，搞得曹操极为难堪。两汉魏晋看重出身门第，与曹操的卑微出身不同，丁夫人生于高门，除了其自身情绪之外，其家门势力也给了她一定底气。

因门第不同，地位悬殊，加之性格孤傲，丁夫人自然看不上庶民出身的卞夫人，经常对其恶言相加，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。216年，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，219年，卞氏被扶正，立

没有偏向谁。虽然含有明哲保身的意味，但也不能不令人佩服她的“忍耐力”。当她的长子曹丕被立为太子后，一些随从人员纷纷前来给丁夫人道贺，并说：将军（曹丕）被立为太子，天下都为之高高兴兴，王后您应当把府库中的金银玉帛拿出来进行赏赐。卞夫人答：魏王因曹丕已长大成人，方才立他为太子承嗣王位。我没犯教子无方的过错就已是莫大荣幸了，又有什么值得大肆张扬、赏赐众人的呢？听到这番话，曹操很高兴，评价丁夫人：“怒不改颜，乐不忘本。”

在追随曹操东征西讨的过程中，卞夫人也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。《魏书》说她：“性勤俭，不尚华丽，无文绣珠玉，器皆黑漆。”一次，曹操从外面得来几副精美的耳饰，先拿给卞夫人挑。结果，卞夫人只选了一副中等的，曹操很惊讶，问她为何不拿副好的啊？卞夫人回答说：“取其上者为贪，取其下者为伪，故取其中者。”

曹丕称帝，卞夫人为皇太后，但她更加谨慎，绝不铺张浪费，主动削减御食，有时饭菜竟无鱼无肉，宫中金银器物也命人全部拿走，还用她那一套漆器。随军征行，每当见到白首老者，就停车嘘寒问暖，赐与绢帛，边擦眼泪边说：我此生最大的恨事，就是父母不能活到今日，不能享受荣华饱暖。而见到娘家人，则不假以颜

卞夫人(161—230年)是魏文帝曹丕、任城威王曹彰、陈思王曹植、萧怀王曹熊的母亲。其后，虽贵为皇后、皇太后、太皇太后，她非但没有醉心于权力，还保持着简朴生活，以美德影响了曹家三代人。

影响曹魏三代人的卞夫人

为王后。按理说，卞夫人名正言顺之后，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对丁夫人打击报复，但她不计前嫌，以大局为重，甚至以德报怨，经常将自己所得馈赠给丁夫人。有时趁曹操外出，偷偷将丁夫人从娘家接回来，“延以正坐”，自己则坐次席，迎来送往，有如昔日。种种举动，令丁夫人大为感动，也懊悔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，惭愧地说：“放废之人，夫人何能常尔耶！”丁夫人病故后，卞夫人请求曹操厚葬之，曹操应允。

曹操能够听从卞夫人的劝告，并不完全是因为对其宠爱有加，而是卞夫人深明大义，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，稳定后院，是曹操的得力助手。189年，权臣董卓弑何太后，废汉少帝，立汉献帝，实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，东汉政权名存实亡，激起公愤。曹操刺杀董卓未遂，仓皇微服出逃，而外界传言其已经毙命。消息传来，谯县曹府上下顿时一片大乱，许多旧部都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。面对即将树倒猢猻散的局面，卞夫人再次展现出不俗的一面，沉着应对。她挺身而出，对那些将要逃离的部属说：“曹君吉凶未可知。今日还家，明日若在，何面目复相见也？”光凭几句流言，你们就辍别而去，明日若曹君返回，将有何面目担当？正因为有难，我们才能一起担当，才要共赴生死啊！一席话说得众人无不汗颜，惭愧不已，打消了此前的念头，仍留在曹府。年轻的卞夫人以沉着冷静和远见卓识，保全了曹府一家老小，也做通了曹操旧部的思想工作，为曹操乱世创业中，保留下来一支弥足珍贵的力量，这也得到了曹操的信任和赏识。

怒不改颜，乐不忘本

建安初，丁夫人被废后，曹操立卞夫人为续室，把几个儿子都交给卞夫人抚养和照顾。216年，曹操当上魏王后，儿子们就开始为继承王位展开了一系列明争暗斗，在曹丕和曹植的博弈中，卞夫人始终保持沉默，并

色，常常告诫他们：“居处当务节俭，不当望赏赐。”并表示自己嫁了曹家四五十年，行俭日久，不能坏了规矩，你们若是作奸犯科者，一律罪加一等。

正是在卞夫人以身作则的带动下，开创之初的曹魏后宫，朴素节俭成风。

前车之鉴，不预政事

东汉之所以亡国，外戚专权是一个重要原因，这也是最为后世所诟病的。自从吕后开了汉代太后临朝听政的先河，外戚便作了皇权的延伸，成为朝堂之上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。每当幼帝长大成人，势必会夺回自己的权力，就不得不依靠宦官，来剪除外戚势力，结果又会导致宦官集团的权力膨胀。从外戚到宦官，从宦官到外戚，汉朝的元气就在这个死循环里一天天被耗尽。基于汉朝亡国的前车之鉴，曹丕称帝后，曾打算追封外祖母。尚书陈群上奏说：陛下开创江山社稷之大业，所定礼仪制度，应当永为子孙后世遵循。从历代典章看，未有因妇人之故而封王拜侯的做法，否则不合礼仪。秦朝违背古礼，汉又承袭秦朝做法，所以吃了亏。曹丕不但同意了陈群的观点，还以皇帝的名义形成诏制，藏于台阁，以作后世永久之制度。这样，直到卞夫人去世前，才追谥其祖父下广王为“开阳恭侯”，父亲为“敬侯”。

魏一代后妃之家，虽都享受荣华富贵，但从未出现外戚专权的情况。不干预政事，也是卞夫人给自己立下的底线。当然涉及亲近，卞夫人还是有所干预的，比如儿子曹植、弟弟曹芳、小叔子曹芳，卞夫人都为他们求过情。但这种干预不是权力欲望支配，而是人情使然。

太和四年(230年)五月，卞夫人病逝，享年70岁。死后合葬曹操高陵。

赵威